

漢代胡人的文面圖樣及其與 內陸歐亞之關係*

陳健文**

摘要

在匈奴史的研究中，匈奴與內亞游牧伊朗人（如塞種）間的關係，是較為中文史學界所忽視的面向。本文擬從一種漢代胡人臉上的圓圈狀文面圖樣入手，探討此種文面習俗與內陸歐亞之關係。本文發現漢代胡人臉上的圈形文面圖樣，與伊朗安息人的文面圖樣相當一致，而此種圈形文面在中亞地區有長久流傳的歷史，可能是早期伊朗人的一項重要傳統。由漢代匈奴與安息人擁有相同文面習俗一事來看，匈奴文化中存有許多顯著的伊朗色彩，伊朗系的早期游牧民如塞種等族群，可能曾在匈奴部落聯盟中有過重要的角色，匈奴的種族與文化疑似受過游牧伊朗人明顯的影響。

關鍵詞：胡人、匈奴、文面、內陸歐亞、安息人、游牧伊朗人、塞種

*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中研院史語所邢義田院士及法國高等實踐研究院施品曲小姐熱心惠示資料，復蒙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1944 年，岑仲勉發表了〈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一文，提出匈奴與波斯之間的關連性，並暗示匈奴曾受波斯文化之影響。¹該文發表至今雖已逾六十年，然在學術界似未引起迴響。本文從漢代胡人²臉上的圓形文面³入手，希望能藉此揭示匈奴與早期游牧伊朗人之間的密切關係。此種圓圈狀的文面圖像，應與伊朗安息王朝貴族臉上的圓形文面屬於同一系統。至於此種圈狀文面圖樣的起源至今仍不明確，似可追溯至早期印歐人的文身傳統。此種文面在早期伊朗文化中為一種顯貴之表徵，與中國古代黥面所展現的刑罰意義大相逕庭。從漢代胡人圖像存有此種文面圖樣來看，匈奴可能吸收了早期游牧伊朗人的文面傳統，且匈奴組成份子中應有不少來自中亞的伊朗系早期游牧民，因此斯基泰、塞種等游牧伊朗人與匈奴的早期關係值得學界再次思考。

一、漢代胡人與早期中國北方民族的文面

在漢代胡人圖像的研究中，胡人臉上的文面是值得注意的一個觀察面向。以往學界曾關注過所謂胡人特徵的辨識問題，此問題經邢義田、高現印、鄭岩、霍巍等多位學者的努力，已為學界提出了一些判定的基準，⁴為我們在探討胡人圖像問題時提供了相

¹ 岑仲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文收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9-36。該文原載《真理雜誌》，1：3（重慶，1944年），頁309-314。

² 有關本文所指涉的「胡人」，主要指匈奴及來自西域的族群，有關漢代「胡人」一詞的意涵，若從漢代的語境來分析，其主要指涉的對象是匈奴。相關討論參見拙著，《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第二章，〈「胡」字的語源與早期文獻中「胡」的指涉對象〉，頁19-102。

³ 本文所使用的「文面」一詞，係指在臉上部位施以刺青或繪面兩種意涵。因就考古圖像而言，我們並不能去判定這類的顏面記號究竟是屬於刺青或是繪記，故本文捨刺青而採用含意較廣的「文面」一詞。

⁴ 上述學者大致認為在漢代的圖像史料中，胡人外貌通常具有以下特徵：一、頭戴早期內亞游牧民族（特別是塞種）常見的尖帽，著緊身衣褲。二、容貌上呈現深目、高鼻、高顴、多鬚的外貌。三、頭髮多呈披髮或椎結狀。詳參衫原たく哉，

當重要的判別依據。至於如何去界定圖像上的人物是否為胡人？確有其一定的爭議性。幸而在某些畫像石上，曾留有標示畫面中人物的榜題，如「胡王」、「胡將軍」、「胡奴門」等字樣，為我們在判定何者為胡人時提供了主要的依據。而下文所欲討論的胡人文面圖像材料，即恰屬這類有榜題的圖像。

1985年4月，在河南省方城縣楊集鄉發現了一個墓門柱石畫像，圖像右上部刻有「胡奴門」之榜題。畫面中的胡奴右手持簪，左手握斧扛於肩上，被稱為「擁彗捐鉞胡奴門」像。⁵畫面中的胡人高鼻多鬚，臉上有一圓形的文面符號（圖1）。⁶有學者認為此文面應是統治者對奴隸所施加的黥記，⁷如劉玉生認為河南扶溝縣吳橋村漢墓的畫像磚上，有不少面頰上有印記的亭長形象，⁸應是受過黥刑的門吏。這當然是一種合理的解釋，但是觀察吳橋村漢墓其他畫像磚上的人物造型，幾乎臉頰上都有片狀之陰影，又似乎不能排除這種臉頰上的暗影，或許是工匠為表現臉頰部位所使用的一種造型手法。

〈漢代畫像石に見られる胡人の諸相〉，《早稻田大學大学院文學研究科紀要文學・藝術學編》，別冊第14集（東京，1987），頁219-235；高現印，〈淺論南陽漢畫中“胡人”特徵及相關問題〉，《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頁316-321；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藝術史研究》，第一輯（1999），頁133-150；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台北，2000），頁15-99。

⁵ 劉玉生，〈淺談“胡奴門”漢畫像石〉，文收南陽漢代畫像石學術研討會辦公室編，《漢代畫像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286-288。

⁶ 王建中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第6卷（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0），圖43。

⁷ 劉玉生，〈淺談“胡奴門”漢畫像石〉，頁287；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142。

⁸ 郝萬章，〈扶溝吳橋村發現漢代畫像磚〉，《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頁50-53。



圖 1 河南方城縣楊集出土「胡奴門」畫像石

資料來源：摘自《中國畫像石全集》，第 6 卷，圖 43。

另一個臉部有圓形文面圖案的漢代胡人圖像，出現在山東泰安岱廟的石柱上（圖 2）。⁹此胡人亦作站立擁篲狀，頭戴微向前彎之尖帽，深目高鼻，臉部有一以陰刻呈現之圓圈狀文面。此胡人所戴之尖帽，常見於斯基泰（Scythian）、塞種（Saka）等游牧伊朗人的服飾，對此邢義田先生已有專論，¹⁰此處不贅。此一圓形文面胡人的造型，與前述河南方城的「胡奴門」畫像石極為類似，究係這兩個圖像上的圓圈狀文面是漢人所施以的黥記，抑或另有特殊來源，將是本文探索的重點。

⁹ 此圖相片由邢義田院士拍攝，蒙邢先生惠賜使用，在此謹申謝忱。

¹⁰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15-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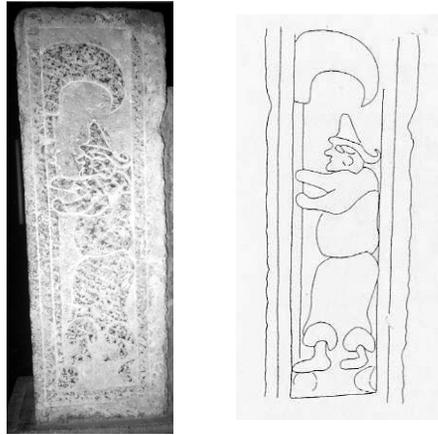


圖2 山東泰安岱廟石柱的擁簪胡人像

資料來源：摘自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74，圖10（右圖為邢義田先生摹本、左圖相片為邢義田先生攝影）。

臉上有文面的外族圖像其實在先秦時期也有兩例，一是甘肅靈臺白草坡所出土的西周人頭鍪鉤戟（圖3）。¹¹該人頭像濃眉巨眼，披髮捲鬚，腮部有“ω”形紋飾，有學者認為表現出白種人的特徵。¹²

類似的文面例子還有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所藏的人頭鍪鉞（圖4）。依據林已奈夫的資料，此人頭鉞的年代屬於西周，¹³但周緯認為是殷商之器。¹⁴其臉頰部位也有疑為刺青的圖記，圖案近於甘肅靈臺白草坡的人頭戟。此人頭鉞的族屬疑來自北方，其髮式近似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的一尊石雕人像。該石像被

¹¹ 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頁115，圖13；李永良主編，《河隴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頁79，圖92。

¹²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文物》，1989年第1期，頁71-73；川又正智，《漢代以前のシルクロード》（東京：雄山閣，2006），頁31-34。

¹³ 林已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頁307；徐良高，〈商周青銅器“人獸母題”紋飾考釋〉，《考古》，1991年第5期，頁443，圖2-1。

¹⁴ 周緯，《中國兵器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頁252，圖版第25說明。

認為屬於紅山文化早期（圖 5），¹⁵髮式同樣是從眉弓開始，沿著前額向上有一微漸隆起的凸脊，較不同之處在於其面部特徵中的眼部呈凹陷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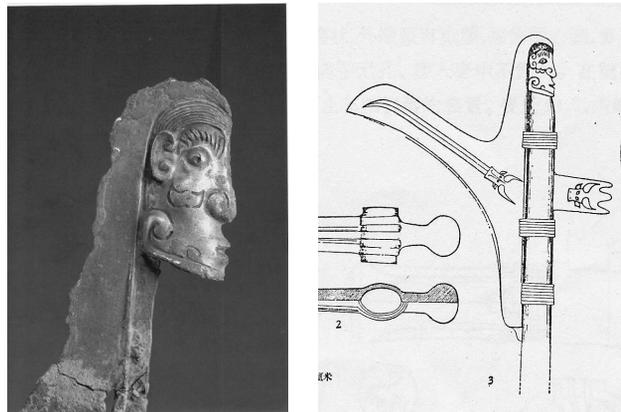


圖 3 甘肅靈臺白草坡人頭鑿鉤戟

資料來源：摘自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考古學報》，1977 年第 2 期，頁 115（右）、李永良主編，《河隴文化》，頁 79·圖 92（左）。



圖 4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所藏的人頭鑿鉞

資料來源：摘自林巴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文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頁 307（左）；周緯，《中國兵器史》，頁 252（中）；徐良高，〈商周青銅器“人獸母題”紋飾考釋〉，頁 443（右）。

¹⁵ 朝格巴圖，〈巴林右旗出土石雕人像〉，《北方文物》，2002 年第 4 期，頁 52。



圖 5 內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石雕

資料來源：摘自朝格巴圖，〈巴林右旗出土石雕人像〉，頁 52。

文身是人類古老的身體裝飾習俗，在中國的周遭鄰近地區，譬如居住於滿州的通古斯系民族，以及朝鮮、日本與東北亞的所謂「古亞細亞族」，一般都有施行文身的習俗。¹⁶中國境內的文身現象在先秦時期已見諸史籍，¹⁷除了東夷的文身外，中國東南方一帶的越人也盛行文身之俗。¹⁸如《史記·周本紀》載：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¹⁹

至於文身的動機，據學者研究大抵有以下幾種：一、做為種族或男女的標誌。二、作為階級的表徵。三、作為勇者的標識。四、作為顯示婚期女子的表徵。五、宗教的理由。六、身體的裝飾或化妝。七、為醫療目的而施行。八、刑罰、威嚇、性的動機、流

¹⁶ 三上次男，〈東北アジアの文身國〉，文收氏著，《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頁471、480。

¹⁷ Carrie E. Reed, "Early Chinese Tattoo," *Sino-Platonic Papers*, 103(June, 2000), pp.1-52.

¹⁸ Heather Peter, "Tattooed Faces and Stilt Houses: Who Were the Ancient Yue?," *Sino-Platonic Papers*, 17(April, 1990), pp.1-27.

¹⁹ 漢·司馬遷，《史記》（台北：宏業書局，1995，點校本），卷4，〈周本紀〉，頁115。

行、好奇心等。²⁰

不同於其他將文身做為正面意義表徵的民族，中國卻將黥面作為刑罰的一種形式，其起源疑可上溯至商代。²¹同樣將黥面做為奴隸記號的還有古代希臘，值得注意的是 Jones 指出希臘人之所以將奴隸施以黥記，應是受到波斯人文身習俗的影響。²²那麼中國古代將黥記作為一種懲罰，是否也是基於同樣的情況？即源自對異族習俗的一種鄙夷。中國北方至少自商代起就有一些文身的人群圖像，如殷墟婦好出土的跪坐人像，身上即有文身的圖案（圖 6）。²³又日本天理參考館藏有一商代青銅人物形竿頭飾，人物為一裸體女性，身上有疑似刺青的圖案。紋樣與殷墟婦好墓出土跪坐人像背部刻痕類似，呈半蹲坐狀，跣足，腳下刻有青蛙圖案，當為部族之標誌（圖 7）。²⁴該人像的年代有爭議，天理參考館圖錄認為是商代，但林已奈夫認為是春秋後期（前五世紀前半）。²⁵另一例為茹家莊墓地一號車馬坑所出土的青銅軛飾人像，其背後刻有明顯的刺青，主題為兩隻相背回首的小鹿（圖 8）。²⁶《史記·匈奴列傳》中曾提及：「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²⁷劉敦愿先生曾根據茹家庄的這件青銅軛飾指出，此處所指的四白狼四白鹿，很可能指的是當時俘虜了八個分別以狼和鹿為圖騰的犬戎部落。²⁸足見先秦時期中國北方確有不少文身族群與華

²⁰ 吉岡郁夫，《身体の文化人類學——身体變工と食人》（東京：雄山閣出版，1994），頁60-65。

²¹ 宋鎮豪，〈甲骨文中所見商代的墨刑〉，文收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第15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89-198。

²² C. P. Jones, "Stigma: Tattooing and Branding in Graeco-Roman Antiquit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7(1987), pp.146-147.

²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53。

²⁴ 天理參考館編，《シルクロードの古代文物——天理參考館50周年記念——》（奈良：天理參考館，1980年），圖9。

²⁵ 林已奈夫，〈殷周の「天」神〉，《古史春秋》，第6號（東京，1989），頁3；又氏著，《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文様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三——》，頁105。

²⁶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魚國墓地》，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403。

²⁷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881。

²⁸ 劉敦愿，〈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解——兼論寶雞茹家庄出土青銅車飾

夏為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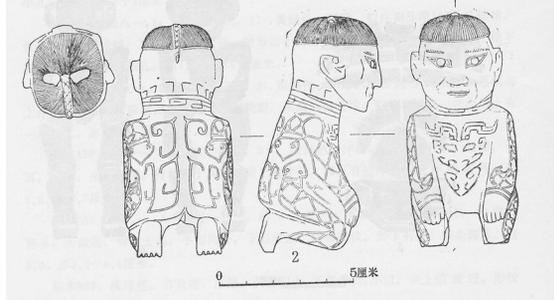


圖 6 殷墟婦好墓出土跪坐人像

資料來源：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153，圖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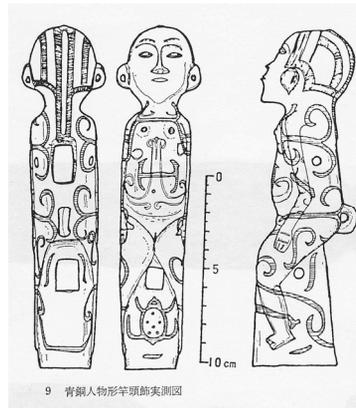


圖 7 天理參考館所藏商代青銅人物形竿頭飾

資料來源：摘自天理參考館編，《シルクロードの古代文物——天理參考館50周年記念》，圖9。

族屬問題》，《人文雜誌》，1986年第4期，頁110；內田吟風認為此種記載除圖騰說外，也有可能是象徵征服了將馴鹿、狼作為役獸的通古斯及突厥多數部族的一種比喻，參氏著，〈周代の蒙疆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卷4-5號（京都，1939），頁16；內田吟風、田村實造等譯注，《騎馬民族史1正史北狄傳》（東京：平凡社，1976），頁5，譯文參余大鈞譯，〈《史記·匈奴傳》箋注〉，《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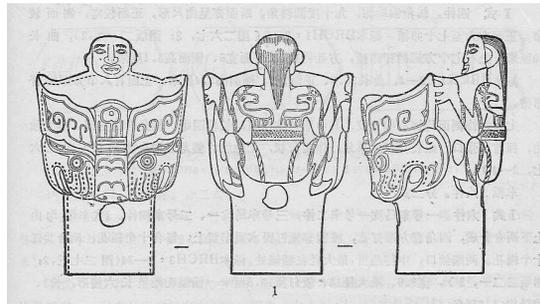


圖 8 茹家莊墓地青銅軛飾

資料來源：摘自盧連成、胡智生，《寶雞魚國墓地》，上冊，頁 403。

三國時代的鍾繇曾說過「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²⁹，匈奴人似有黥面之俗，《史記·匈奴列傳》云：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黥面，得入穹廬。³⁰

可以看出漢使王烏因為「習胡俗」，在主動黥面後遂得入穹廬面見單于，故不能排除黥面是匈奴之故俗，³¹因此要求漢使須入境隨俗。這個記載透露出匈奴之所以要求漢使必須黥面，應是藉由這個動作來宣示除非認同「胡俗」，否則漢使沒有入穹廬面見單于的資格。此為一種展現匈奴文化主體性之動作，目的在強調匈奴的高政治姿態，一方面是示威，另一方面也是以自身的文化為榮。漢文帝時隨嫁進入匈奴的宦官中行說，就曾經勸告單于須堅持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絕不可貪於漢朝贈送的絲綢綾緞而降低匈奴的文化位階。³²故此可以看出匈奴人堅持漢使必須黥面，應非模仿自漢人將罪犯或奴隸施以黥記的作法，而是凸顯黥面為其故俗的一

²⁹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志》（台北：宏業書局，1997，點校本），卷12，〈毛玠傳〉，頁376。又另參戴振輝，〈兩漢奴隸制度〉，《食貨半月刊》，1：7（上海，1935），頁34。

³⁰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913。

³¹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22，注22；蓋山林，〈從陰山岩畫看我國古代北方游牧人的習俗〉，《內蒙古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頁105-110。

³²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899。

種文化自信，進而要求漢人必須認同。

由上述的考古圖像分析可知，至少從西周時代開始，中國北方地區就出現了以“ω”形符號來文面的習俗，降及漢代，胡人的臉上亦有圓形的文面出現。有關這兩種文面符號之來源，目前尚不明瞭。至於此種文面習俗的來源，不能排除是北方戎狄的古老傳統，然後再影響到漢代的胡人；但也有可能此種文面習俗是源自早期內陸歐亞地區的古老傳統，³³因為在伊朗及中亞地區，文面也是該區常見的習俗，而且上述的這兩種文面符號，都可在伊朗及中亞地區找到相關的聯繫線索。

二、早期內陸歐亞的圈形文面傳統

中國北方緊鄰內陸歐亞地區，先秦時期的戎狄、周人、秦人與內陸歐亞長期以來存有文化與族群間的互動關係。³⁴從考古出土文物中，可以觀察到漢代胡人的文面其實與內亞地區的文面傳統關係密切。活躍於內亞地區的游牧民族與其他早期印歐人，都有文身的傳統見諸史籍。

1964年，考古學家在伊拉克的 Hatra 聖殿，發現了幾個羅馬時期的統治貴人塑像，其中一位人像疑為當時的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98-117A.D.在位）。可看出在羅馬貴人耳旁兩側的臉頰部位，有類似河南方城楊集畫像石胡奴臉上的圓圈形文面圖樣。若從細部來看，此種文面應呈類似甜甜圈的重圈狀（圖9、10、11）。³⁵

³³ 筆者曾對早期印歐人兩頰的捲雲狀文面圖樣作過初步研究，此種捲雲狀文面曾出現在中國西周時期的考古出土物。參拙著，〈從文面圖像看內亞高加索種游牧民族與華夏民族的早期接觸〉，《故宮學術季刊》，29：2（台北，2011），頁77-113。

³⁴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銅器〉，《大陸雜誌》，87：5（臺北，1993），頁23；A. A. Kovalev, “The Location of Loufan Tribe in 4-2 Century B.C. and Influence of Its Culture to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 and the South”, in 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組編，《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283-394。

³⁵ J. M. C. Toynbee, “Two Male Portrait-Heads of Romans from Hatra,” *Summer*, Vol. 26 (1970), pp. 231-236; J. M. C. Toynbee, “Some Problem of Romano-Parthian Sculpture at Hatra,”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2(1972), pp.106-110; Ivenernizzi, Antonio. “Facial Marks in the Parthian World,”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1(1990), pp.3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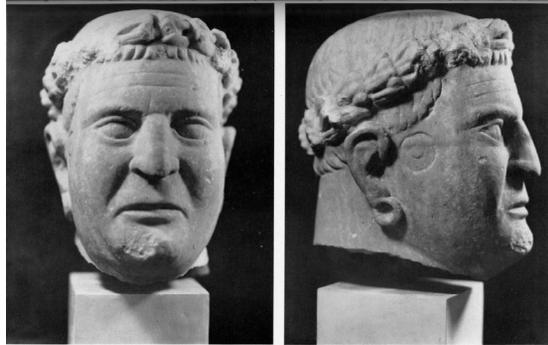


圖 9 伊拉克 Hatra 聖殿的羅馬皇帝圖拉真頭像

資料來源：摘自 J. M. C. Toynbee, "Some Problem of Romano-Parthian Sculpture at Hatra," Pl. V.



圖 10 伊拉克 Hatra 聖殿的羅馬貴人頭像

資料來源：摘自 J. M. C. Toynbee, "Some Problem of Romano-Parthian Sculpture at Hatra," Pl.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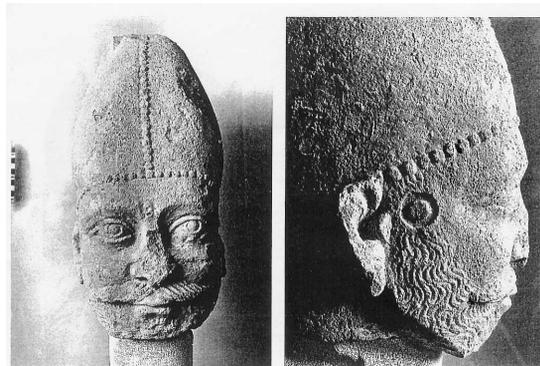


圖 11 伊拉克 Hatra 聖殿的祭司頭像

資料來源：摘自 Ivenemizzi, Antonio. "Facial Marks in the Parthian World," p.48. fig.5

由於歐洲的羅馬貴人並無在臉上施以圓形文面的習慣，故學者推斷這些羅馬貴人臉上的圓圈形文面，並非是永久性的刺青，而是受到鄰近安息人（Parthians）習俗影響而塗繪上的某種暫時性符號。³⁶相同的圓形文面也出現在同一時期中亞的貴霜（Kushan）錢幣上，貴霜建國之初，曾受安息文化的強烈影響，故在貴霜早期的錢幣中，貴霜統治者耳旁的臉頰部位，也有類似的圓形文面圖樣。在貴霜王迦膩色迦（Kaniska）一世（1-3th A.D.）（圖 12）³⁷以及繼任者胡韋（毗）色迦（Huvishka）王（1-3th A.D.）的錢幣（圖 13³⁸、圖 14³⁹）上，都可以發現相同的圓形文面圖樣。



4

圖 12 貴霜王迦膩色迦（Kaniska）一世（1-3th A.D.）
錢幣上的圓圈形文面

資料來源：摘自 Harry Falk, “Appendix: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o-called Kaniska Casket,” p.118.

³⁶ Ivenernizzi, Antonio. “Facial Marks in the Parthian World,” pp.36-38.

³⁷ Harry Falk, “Appendix: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o-called Kaniska Caske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III(2002), pp.111-120.

³⁸ Katsumi, Tanabe “Hatra, Sasanian Persia and Gandhara: The Problem of Star-and-Crescent,” *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 10(1988/89), pp.77-89.

³⁹ Laura Giuliano, “Studies in early Saiva Iconography: (I) the origin of the trisula and some related problem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X(2004), pp.51-96.



圖 13 貴霜胡韋（毗）色迦（Huvishka）王（1-3th A.D.）
錢幣上的圓圈形文面

資料來源：摘自 Katsumi, Tanabe “Hatra, Sasanian Persia and Gandhara,” p.83.



圖 14 貴霜胡韋（毗）色迦（Huvishka）王（1-3th A.D.）
錢幣上的圓圈形文面

資料來源：摘自 Laura Giuliano, “Studies in early Saiva Iconography: (I) the origin of the trisula and some related problems,” p.90.

在伊朗及中亞地區，此種雙圈形文面有更多的發現。日人田邊勝美已舉出極多的例子，如伊朗東部 Kerman 出土的帶扣（西元前 1-後 2 世紀）上，有兩個面對面的人物半身像，可清楚看出此二人臉頰部位有相同的圈狀文面（圖 15）。⁴⁰又在伊朗東部的中

⁴⁰ 田邊勝美，《ガンダーラから正倉院へ》（京都：同朋舎出版，1988），頁142。

亞地區，可以看到更多此種圓形文面的例子（圖 16⁴¹、圖 17⁴²）。除了田邊氏所舉的例子外，大夏地區（Bactria）此類的例子甚多。在中亞舊撒馬爾干城的貴霜晚期 Afrasiyab 遺址，有同樣的圓形文面女神泥土塑像（圖 18）。⁴³在達爾弗津之丘（Dalverzin-tepe）所出土的陶土女神像，臉頰上也出現同類的圓形文面（圖 19）。⁴⁴另外在中亞粟特錢幣上的統治者人頭像，其眼下臉頰的部位亦可發現有圓形的文面記號（圖 20）。⁴⁵



61 青銅製バックル 伝ケルマーン出土

圖 15 伊朗東部 Kerman 出土帶扣（西元前 1-後 2 世紀） 人像上的圓圈形文面

資料來源：摘自田邊勝美，《ガンダーラから正倉院へ》，頁 142。

⁴¹ 田邊勝美，〈眉間白毫相のイラン起源考—仏像のイラン起源論序説—〉，《佛教藝術》，第162號（東京，1985），頁29-67。

⁴² 田邊勝美，〈眉間白毫相のイラン起源考—仏像のイラン起源論序説—〉，頁46。

⁴³ Richard N. Frye, *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pansion*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6), p.138.

⁴⁴ Djangar. Ya. Ilyasov & Tigran.K.Mkrtychev, "Bactrian Goddess from Dalverzin-tepe,"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II(1991/2), pp.107-217.

⁴⁵ Kazim Abdullaev, "Nomad Migr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Joe Cribb & Georgina Herrmann ed.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Oxford: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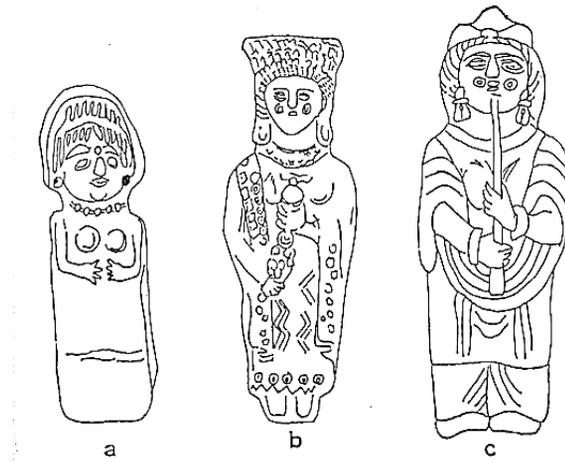


圖 16 中亞出土小塑像上的圓形文面

a. 西元前一千紀後半葉 b. 西元 2-3 世紀前 c. 西元前 2-4 世紀

資料來源：摘自田邊勝美，〈眉間白毫相のイラン起源考—仏像のイラン起源論序説—〉，頁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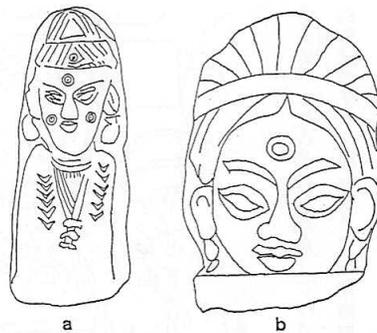


圖 17 中亞出土小塑像上的圓形文面

a. 西元 2-3 世紀 b. 貴霜時期 (1-3th A.D.)

資料來源：摘自田邊勝美，〈眉間白毫相のイラン起源考—仏像のイラン起源論序説—〉，頁 46。



圖 18 Afrasiyab (舊撒馬爾干) 出土貴霜晚期女神像

資料來源：摘自 Richard N. Frye, *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pansion*, p.138.



圖 19 達爾弗津之丘 (Dalverzin-tepe) 出土女神像的圓形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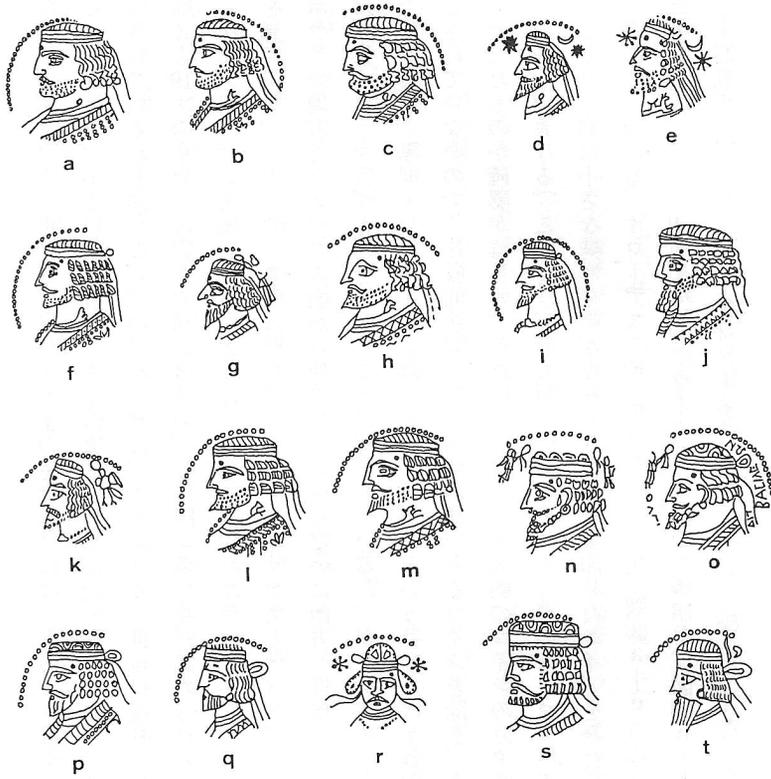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摘自 Djangar. Ya. Ilyasov & Tigran. K. Mkrtychev, "Bactrian Goddess from Dalverzin-tepe," pp.125-126.



圖 20 粟特錢幣人頭像的文面記號

資料來源：摘自 Kazim Abdullaev, "Nomad Migration in Central Asia," p.92.

有關伊朗地區此種圓圈形文面的起源，可能與安息王朝王室的圓形標記有關。在安息的錢幣中，可發現安息諸王面像的前額部位，經常有一圓點狀的圖案（圖 21）。⁴⁶關於此類圓點圖樣的意義，學者認為是緣自安息王室長期以來臉部的遺傳性濕疣病灶（圖 22），⁴⁷而這種臉部的圓點病徵，後來竟演變成一種象徵王室尊貴血統的表徵，以致後來遂以文面的方式來表現。



60 パルティア王の肖像（コインの表）

圖 21 安息錢幣諸王面像前額的圓點狀圖案

資料來源：摘自田邊勝美，《ガンダーラから正倉院へ》，頁 140。

⁴⁶ 田邊勝美，《ガンダーラから正倉院へ》，頁 140。

⁴⁷ Gerald D. Hart, "Trichoepithelioma and the Kings of Ancient Parthia,"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94(1966), pp.547-549; Gerald D. Hart, "The Diagnosis of Disease from Ancient Coins," *Archaeology*, 26:2(1973), pp.123-127.

類似的情況也可見於中亞地區長期以來的變形頭骨習俗，二者都是某種彰顯貴種血統的外在表徵。⁴⁸在中亞地區的貴霜人、嚙嚙人與匈人之間，都曾流行過人工頭骨變形的習俗（圖 23），⁴⁹其目的皆在彰顯其尊貴血統。在唐代的新疆地區，疏勒與龜茲也都有變形頭骨風俗的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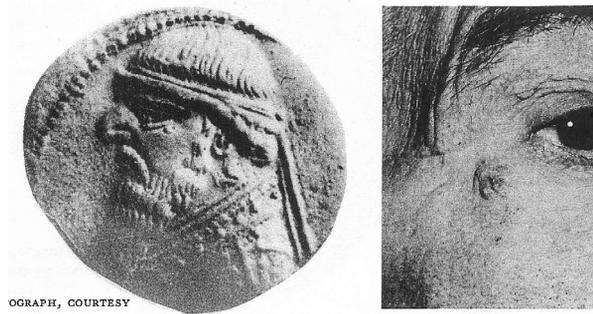


圖 22 安息王室臉部常見的濕疣病灶

資料來源：摘自 Gerald D. Hart, “The Diagnosis of Disease from Ancient Coins,” p.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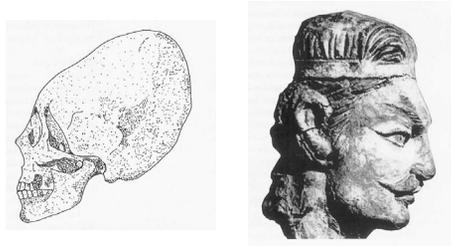


圖 23 中亞地區貴霜人的人工變形頭骨

資料來源：摘自 Iaroslav Lebedynsky, *Les Saces*, p.15

《新唐書·西域傳上·疏勒國》：俗尚詭詐，生子亦夾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

《新唐書·西域傳上·龜茲國》：一曰丘茲，一曰屈

⁴⁸ Aurelie Daems & Karina Croucher, “Artificial Cranial Modification in Prehistoric Iran: Evidence from Crania and Figurines,” *Iranica Antiqua*, 42(2007), pp.1-21.

⁴⁹ Iaroslav Lebedynsky, *Les Saces* (Paris: Editions errance, 2006), p.15.

茲，……俗善歌樂，旁行書，貴浮圖法。產子以木壓首。⁵⁰

田邊勝美甚至進一步認為貴霜時期犍陀羅佛像前額的白毫（*urnâ*），即是起源自此種伊朗人的圓形文面傳統。如阿富汗黃金之丘（Tilly Tepe）所出土的西元前後早期游牧民族墓葬人像中，其前額部位即有此類的雙圈形圖樣，而這正是犍陀羅佛像前額白毫的起源。且當時中亞地區還流行在前額與臉頰部位施以圓點狀的文面圖樣，此乃唐代婦女臉部花鈿裝飾之源流。⁵¹

源自伊朗與中亞地區的圓形文面圖案，至唐代仍在新疆仍持續流傳。克孜爾石窟的摩耶窟（約西元 6 世紀）中，有一手持舍利罐天神圖像，其雙頰與下巴即有圓形的文面圖樣（圖 24）。⁵²相同造型的文面圖樣也出現在克孜爾第 224 窟的壁畫（約 6-7 世紀）中，畫面中有一疑為突厥人之辮髮男子，正引刀作髡面狀，其臉頰與下巴的文面（圖 25）⁵³正與摩耶窟類似。另在唐代阿斯塔那古墓的伏羲女媧圖中，亦可發現女媧臉上同樣有著紅色圓形的花鈿圖樣（圖 26）。⁵⁴在新疆地區墓葬中所出土的乾屍身上，也經常可見在臉上文面的習俗，⁵⁵足見此種圓形文面應是內亞地區的古老傳統，長期以來持續影響著活動於該區的諸多民族。在高加索一帶的亞塞拜然、達吉斯坦、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等地居民，時至今日仍有在臉部裝飾圓形文面的習俗，當地居民聲稱這是自古以來的固有風俗（圖 27）。⁵⁶

⁵⁰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221上，〈西域傳上〉，頁6230、6233。

⁵¹ 田邊勝美，〈眉間白毫相のイラン起源考—仏像のイラン起源論序說—〉，頁29-67；田邊勝美，《ガンダーラから正倉院へ》，頁140；Katsumi, Tanabe. "Iranian Origin of the Buddhist Urna," *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 8(1986), pp.41-54; Katsumi, Tanabe. "Iranian Xvarnah and the Treasure of Shosoin at Nara in Japan," *Iranica Antiqua*, 23(1988), pp.365-381.

⁵² 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等著，《新疆佛教藝術》，下冊（烏魯木齊：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頁655，圖版20。

⁵³ 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新疆佛教藝術》，下冊，頁509，插圖225。

⁵⁴ 藝術家出版社編，《絲路文物藝術精華》（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頁37。

⁵⁵ 于志勇，〈新疆地區考古發現的繪身和紋身〉，《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頁98-104。

⁵⁶ 吳妍春，〈西域辮髮與紋身習俗初探〉，《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頁52-58。



手持舍利罐的天神

圖 24 克孜爾石窟摩耶窟天神像的圓形文面圖樣

資料來源：摘自勒柯克 (Albert von Le Coq) 等著，《新疆佛教藝術》，下冊，頁 655，圖版 20。



圖 25 克孜爾第 224 窟榜面壁畫臉頰與下巴的圓形文面

資料來源：摘自勒柯克，《新疆佛教藝術》，下冊，頁 509，插圖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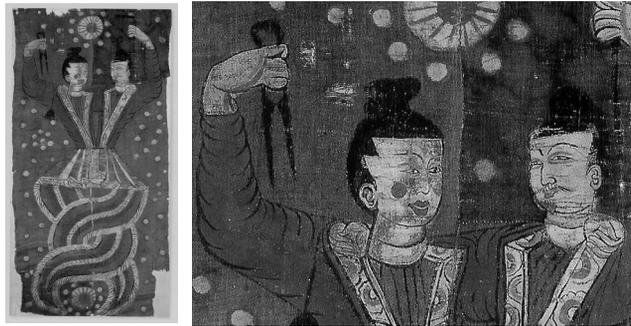


圖 26 唐代阿斯塔那古墓伏羲女媧圖的文面圖樣

資料來源：摘自藝術家出版社編，《絲路文物藝術精華》，頁 37。



图三 阿塞拜疆妇女的纹身

圖 27 亞塞拜然婦女的圓形文面

資料來源：摘自吳妍春，〈西域辮髮與紋身習俗初探〉，頁 55。

至於此種臉部圓圈狀文面之功能與起源，目前尚曖昧不明，Antonio Ivenernizzi 認為圓形文面可能具有某種象徵「神性」的功能。⁵⁷在伊朗西北部的 Hasanlu 曾出土一金杯，可觀察到金杯上有一領羊者，其臉部即疑有此種圓形文面圖樣。該金杯之年代約為西元前 12-11 世紀（圖 28），⁵⁸可說是這類文面圖樣在西亞地區流傳的早期證據。但在地中海地區克里特島的邁錫尼遺址中，也有

⁵⁷ Ivenernizzi, Antonio. "Facial Marks in the Parthian World," p.44.

⁵⁸ 林良一解說，《ペルシアの遺宝》，第二冊（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79年），頁 16圖11。

一臉部圓形文面的頭像，年代約為西元前 13 世紀晚期（圖 29），⁵⁹較伊朗地區的例子更為古老。⁶⁰而幾乎完全相同的文面圖樣也出現在西元 4-5 世紀的烏茲別克考古遺址中（圖 30）。⁶¹邁錫尼文明另有兩例陶俑，其臉頰兩側分別有圓點狀與方形的文面（圖 31），⁶²是一個可資參考的例子。由於邁錫尼文明疑與印歐人的入侵有密切關係，⁶³因之有關此種文面的起源，恐要追溯至更早的原始印歐人起源階段。看來在臉頰兩側文面的習俗，可能是早期印歐人的一項古老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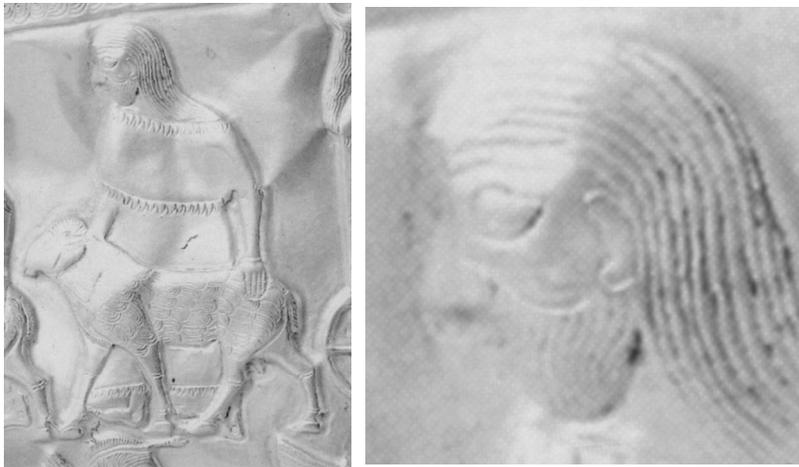


圖 28 伊朗西北部 Hasanlu 出土金杯領羊者的文面圖樣

資料來源：摘自林良一解說，《ペルシアの遺宝》，第二冊，頁 16 圖 11。

⁵⁹ Sir Arthur Evans, *The palace of Minos*, Vol.3 (London: Macmillan, 1930), p.520; Rodney Castleden, *Mycenaea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31.

⁶⁰ 有趣的是早期印歐人另有一種「捲雲狀」的文面圖樣，有學者認為早期歐亞大陸的捲雲紋母題同樣也來自邁錫尼，參見 E. E. Kuz'mina,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Stock-Breeding Husbandry and Ecology of the Steppes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aeological and Palaeoecological Datas (4th Millennium BC- 8th Century BC)," in Bruno Genito e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p.39, fig.6.

⁶¹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寶——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5），圖82。

⁶² Rodney Castleden, *Mycenaeans*, p.148.

⁶³ Robert Drews, *The coming of the Greeks: 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58-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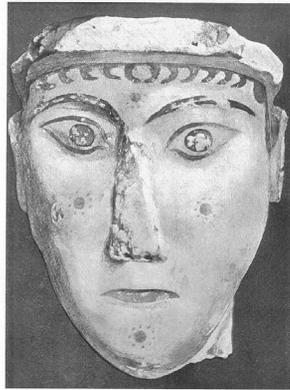


圖 29 邁錫尼文明遺址中有圓形
文面的頭像

資料來源：摘自 Sir Arthur Evans, *The palace of Minos*, Vol.3, p.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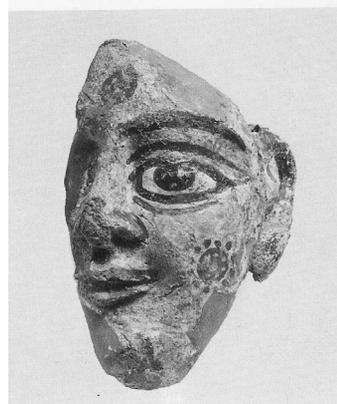


圖 30 西元 4-5 世紀的烏茲別克
考古遺址中的文面頭像

資料來源：摘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寶——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圖 82。



圖 31 邁錫尼文明臉頰有圓點狀與方形文面的陶俑

資料來源：摘自 Rodney Castleden, *Mycenaean*, p.148.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克孜爾 5 號石窟（約西元 7 世紀）前室側牆左邊的壁畫上，畫面上排左側以及下排右側的兩位人像臉上，各有一文面圖樣（圖 32）。⁶⁴令人感興趣的是其文面的圖案樣式，竟與前述甘肅靈臺白草坡人頭戟（參圖 3）及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所藏人頭釜鉞（參圖 4）臉上的“ω”形文面圖樣非常近似。此二者之間的聯繫頗堪玩味，看來甘肅靈臺白草坡人頭戟與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所藏人頭釜鉞所描繪的異族，應與中國北方的內陸歐亞有著某些淵源，儘管中國北方的例子在年代上要遠早於克孜爾石窟的年代，但石窟工匠的手法顯然是西方式的，這其間的相似性應非出自純粹的偶然。除此之外，下排左側人像臉上的彎月形文面圖樣，在漢代也有類似的例子。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有一件西元一世紀漢墓出土的隨葬陶柱，柱端有一作蹲狀之守墓神靈，其面部有類似胡人的特徵，濃眉大眼，嘴上有髭，下巴多鬚，其臉頰兩側即有彎月形之文面圖樣（圖 33）。⁶⁵類似造型的漢墓人像立柱羅森爵士（Jessica Rawson）在其論文中也舉出一例（圖 34），羅森認為該人像的族屬可能來自邊疆。⁶⁶除此之外，山東臨沂白莊出土的東漢晚期畫像石墓中也可見到類似的造型（圖 35），⁶⁷故此神靈可能是以胡人的形象來打造的。儘管克孜爾 5 號石窟的年代與前述的兩件西周人頭戟相差近千餘年，與漢墓立柱的年代差距也有五、六百年，但其臉上文面圖樣的一致性，仍值得我們去留意此類文面習俗在內亞地區頑強的流傳性。文面可能與這個地區長期流行的髡面習俗一樣，⁶⁸都是源自於早期伊朗人的一項重要傳統，然後

⁶⁴ 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等著，《新疆佛教藝術》，下冊，頁503，插圖221。

⁶⁵ 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 translated by Janet Seligman, *The Han Dynasty* (New York: Rizzoli, 1982), p.134. fig.85.

⁶⁶ Jessica Rawson, "Thinking the Pictures: tomb figures in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afterlife,"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1(1996/1997), p.33.

⁶⁷ 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藝術史研究》，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頁133-135；阮榮春，〈「佛教南方之路」北滲山東南部〉，《故宮文物月刊》，14：10（台北，1997），頁81。

⁶⁸ 江上波夫，〈ユーラシア北方民族の葬礼における髡面、截耳、剪髪について〉，文收氏著，《匈奴の社會と文化 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3》（東京：山川出版社，

再往東擴散至中國北方草原地區而為匈奴所承襲，甚至進而影響華夏。



圖 32 克孜爾 5 號石窟人像臉上的“ω”形文面圖樣

資料來源：摘自勒柯克 (Albert von Le Coq) 等著，《新疆佛教藝術》，下冊，頁 503 插圖 221。

1999)，頁311-322；楊希枚，〈論北海、僂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髡面之俗〉，《大陸雜誌》，38：1（台北，1969），頁7-10；谷憲，〈內陸アジアの傷身行為に関する一試論〉，《史學雜誌》，第93編第6號（東京，1984），頁41-57；那順布和，〈論斯基泰髡面習俗的東傳及其意義〉，《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頁67-72。



圖 33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藏漢墓隨葬陶柱之守墓神靈

資料來源：摘自 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 *The Han Dynasty*, p.134. fig.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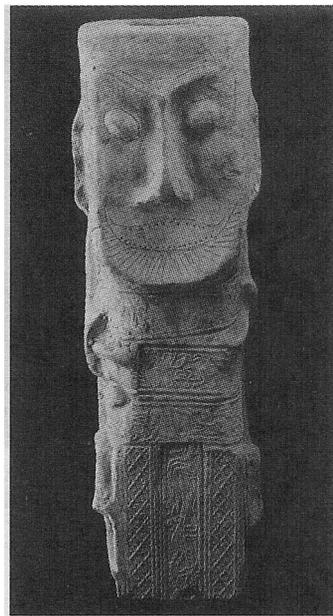


圖 34 漢墓磚柱上疑似胡人造型的人像

資料來源：摘自 Jessica Rawson, "Thinking the Pictures : tomb figures in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afterlife", p.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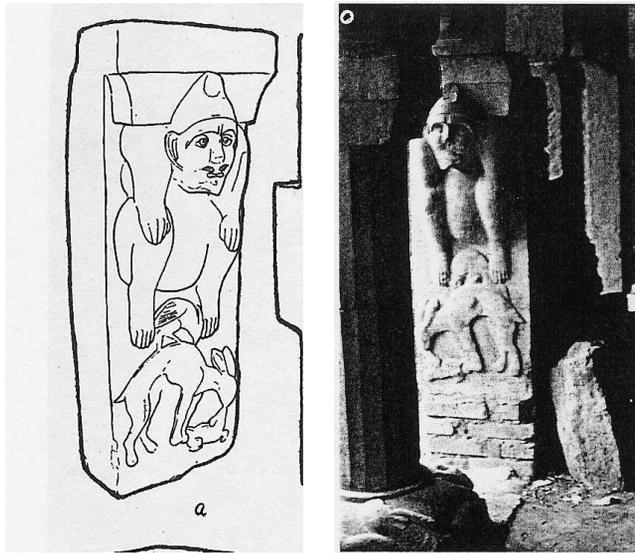


圖 35 山東臨沂白莊出土胡人像

資料來源：摘自鄭岩，〈漢代藝術中的胡人圖像〉，頁 134（左）；阮榮春，〈「佛教南方之路」北滲山東南部〉，頁 81（右）。

三、匈奴與早期游牧伊朗人間的關係

在前述二章中，本文已討論了漢代胡人臉上圓形文面與內陸歐亞間的關係，特別是與安息人文面圖像的高度一致性。安息王朝統治者來自伊朗北方的草原地區，⁶⁹這一帶是早期游牧伊朗人如斯基泰（Scythians）、馬塞蓋特（Massgataes）、薩爾馬特人（Sarmatians）、塞種（Sakas）等族群的活動地域。這些民族彼此間都有緊密的關係，他們可能操東伊朗語（或北部伊朗語），學界或稱他們為「游牧伊朗人」（Iranian Nomads）⁷⁰。而匈奴為何與伊朗系的游牧人群有著相同樣式的文面習俗，的確是個值得思考的

⁶⁹ Ehsan Yarsha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6-27; Malcolm A. R. Colledge, *The Parthian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pp.22-35; Elton L. Daniel 著、李鐵匠譯，《伊朗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頁55。

⁷⁰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p.23-25; 中譯本另參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第二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2），頁4-5。

問題。有關匈奴的語言及族屬，向來學界都傾向認為他們是屬於阿爾泰系統的突厥或蒙古，對此學術界似未有太大的異議。但值得注意的是，學界仍有部分學者提醒我們匈奴與塞種或游牧伊朗人之間的緊密關係，甚至主張匈奴的核心統治成員，其實是來自屬於伊朗人的塞種部落。

在匈奴人的語言方面，早期學者多嘗試從阿爾泰語的角度，來解讀中國文獻上的少量匈奴語詞。不論是從突厥語、蒙古語或通古斯的觀點，學者都有很多的解讀。⁷¹蒲立本另闢蹊徑，從葉尼塞語來解釋匈奴語詞，得出了匈奴語屬於古葉尼塞語的結論。⁷²因此當我們在嘗試解讀匈奴語時，不應完全由阿爾泰語的角度來看問題，也應考慮到其他語言解釋的可能性。譬如早年孫次舟曾就「冒頓」一詞之語源請教過陳寅恪先生，據孫氏所言，陳寅恪曾提示德國學者 Müller 謂該詞實為伊朗語，其義為「火神」。⁷³故以往學界因習慣從阿爾泰語來解釋匈奴語的結果，常容易讓人忽略匈奴語詞可從伊朗語解釋的可能性。⁷⁴如「冒頓」一詞，貝利爵士

⁷¹ 這方面的研究以白鳥庫吉最具代表性，參氏著，〈蒙古民族の起原〉、〈支那本土周圍諸民族〉，均收入《白鳥庫吉全集》，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23-61、549-739。其他研究可另參方壯猷，〈匈奴語言考〉，《國學季刊》，2：4（1930），頁693-740；布特格其，〈從語言學上看匈奴人的族屬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頁56-57；何星亮，〈匈奴語試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頁3-11；岑仲勉，〈冒頓之語原及其音讀〉，《西北通訊》，3：1（1948），頁6-7、12；烏其拉圖，〈部分匈奴語詞之復原考釋〉，《內蒙古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頁53-59；韓景林，〈匈奴語管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5期，頁87-90；蘇克勤，〈匈奴語言系屬問題探討〉，《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4期，頁7-9；奧·普里察克著，耿世民譯，〈匈奴人的文化和語言〉，《民族譯叢》，1989年第5期，頁48-53、47；羅新，〈匈奴單于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頁23-36；蔡美彪，〈成吉思及撐黎孤塗釋義〉，《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2期，頁99-106。

⁷² E. G. Pulleyblank, "The Hsiung-nu Language," *Asia Major*, 9:1-2(1962), pp.239-265. 中譯本另參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63-201。後來 Vovin 補充了蒲立本的說法，Alexander Vovin, "Did the Xiong-nu Speak a Yeniseian Langu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1(2000), pp. 87-104.

⁷³ 孫次舟，〈匈奴出現中國邊塞的時代〉，《西北通訊》，第3期（1947），頁11。

⁷⁴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3, 12:3(2002), pp.289-325.

即從伊朗語釋之，意為「真正的強大」。其他的早期匈奴王號如「頭曼」，伊朗語意為「漸強的力量與愉悅」；而「老上」一詞就伊朗語之角度，可理解為「使光明、使統治」，其詞義一如唐代安祿山之粟特名「祿山」。又如撐犁、孤塗等詞，貝利爵士都有其伊朗語的釋讀角度。⁷⁵有關匈奴的語言歸屬，目前學界探討最多的是《晉書·佛圖澄傳》所留下的一段記載：

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⁷⁶

因漢代文獻留下的匈奴語僅有單詞，故此段話中的「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這完整的句子便引起了學界相當大的興趣。《魏書·羯胡石勒傳》曾載：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匄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⁷⁷

因羯胡是「匈奴別部」，故學界認為此段兼有與語音與釋意的記載，應可幫助我們探索匈奴的語言歸屬。雖然羯胡不見得是匈奴的核心直系部落，且此段羯語的漢語音譯也未必完全精確（譬如我們不能完全忽視方音的影響因素），但因此而起的討論相當多。有從蒙古語與通古斯語角度釋之者，⁷⁸有從葉尼塞語解釋者，⁷⁹更多的學者是從突厥語的觀點來解讀，然都未能提出令學界完全信

⁷⁵ H. W. Bailey, *Indo-Scythians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5-41.

⁷⁶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點校本），卷95，〈佛圖澄傳〉，頁2486。

⁷⁷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點校本），卷95，〈羯胡石勒傳〉，頁2047。

⁷⁸ 白鳥庫吉，〈羯胡考〉，收方壯猷譯，《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57-64。

⁷⁹ Alexander Vovin, "Did the Xiong-nu Speak a Yeniseian Language?," pp. 87-104.

服的論據。⁸⁰對此，貝利爵士也有其伊朗語角度的解讀，⁸¹這說明了研究匈奴問題不能僅依賴阿爾泰學來解決。

在匈奴族稱的來源問題上，也是學界長期以來未能解決的議題。岑仲勉提出波斯《火教經》（阿維斯塔 Avesta）中所提到的 hvyaona 人，應即漢史文獻「匈奴」名稱之來源。他又進一步認為匈奴人名陰山曰「涿邪」，亦得名自《火教經》中之伊蘭語，其義為「好影（well-shadowing）」，與陰山之意正同。故「胡」字之義，當與伊蘭民族有關。他提示我們應留意「匈奴、伊蘭兩族之關係，固有吾人所未明者。」岑氏於文末還特別說明他並非認為匈奴為阿利安種，僅強調匈奴有西來之痕跡，只擬為自西北徙來之突厥種。其人因先與伊蘭近居，自不難挾伊蘭胡以俱至。⁸²貝利爵士也有相似的見解，他認為《阿維斯塔》中曾提到瑣羅亞斯德的贊助者 Vištāspa-，有名為 Hyaona-的敵人，而 Hyaona-一詞之詞源可追溯至 *hyauna，相當於古伊朗吠陀語之 syoná，這些詞在印度—伊朗語中其意為「所有者」（possessor），亦即為「統治者（lord）」，故依此可合理的解釋為何匈奴一詞能作為貴種之名或整個部族的稱號。貝利推測一個名為 *Hyōnāh 的部落在西元前八世紀左右，從阿姆河地區遷徙到東方而成為中國史上的「匈奴」。⁸³最近 Beckwith 也提出「匈奴」一詞，應是源自於伊朗北方名為 *skuḍa（意為射手 archer）部族的某種轉寫，其發音亦可比擬為 *Soydā、*Soylā、*Sak(a)dā 等，⁸⁴梅維恆更認為早在西元前 1200

⁸⁰ E. G. Pulleyblank, "The Hsiung-nu Language," p.264. 最近的研究參見 Sencer Divitçioğlu, "Beyond the Hunnic Couple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8:2(2004), pp.185-191.

⁸¹ H. W. Bailey, *Indo-Scythians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VII*, pp.40-41.

⁸² 岑仲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頁33-36。

⁸³ H.W. Bailey, *Indo-Scythians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VII*, pp.39-41.；孫次舟也持類似的看法，認為匈奴本為西方草原之游牧民族，秦始皇時代方遊蕩至中國，參氏著，〈匈奴出現中國邊塞的時代〉，頁9-11。

⁸⁴ C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404-405. 先前哈隆曾將此詞比擬為月氏，認為月氏的上古音與斯基泰的 *zguja 或 *zgujaka 名稱能對應起來，參見 Von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91:2 (1937), pp. 316-318；但蒲立本不

年，操伊朗語的部落可能已經抵達中國的邊境。⁸⁵

匈奴文化中有不少成分明顯來自游牧伊朗人（如塞種）的影響，譬如在漢代的畫像磚石畫面中，胡人的形象經常是頭上戴著尖頂高帽，而這是內亞游牧伊朗人如斯基泰、塞種的典型裝扮。⁸⁶其次是漢代畫像磚石上的胡人造型，經常將胡人（匈奴人）描繪成深目、高鼻、多鬚狀，呈現明顯的高加索種特徵。在外蒙古所發現的著名諾音—烏拉匈奴墓葬中，曾出土過幾件毛氈織物，其中一件為騎士與馬的主題，兩件為人物像的斷片（圖 35）。⁸⁷Rostovtzeff 強調騎士的服裝與頭飾都是典型的伊朗式，馬飾也與南俄的薩爾馬特人墓葬相似。騎士臉上有髭無鬚，面貌特徵與彼得大帝藏寶中的牌飾類似。⁸⁸魯金科（S. I. Rudenko）認為這些騎士的相貌皆為歐羅巴種（高加索種）類型，他指出匈奴除了與東方的漢朝、烏桓有密切交往外，其實與月氏、烏孫、粟特、安息等其他西方的民族同時也有密切的關係，這可從諾音—烏拉墓葬出土不少西方風格的織物察知。匈奴偶爾會與這些族群的貴人存有姻親關係（如烏孫），彼此間難免會有奢侈品的交換。且匈奴單于的幕營中，或有來自大夏（Bactria）、安息的男女工匠。⁸⁹有學者認為這些毛氈上的騎士像即出自希臘或西亞工匠，透過伊朗而輸出到匈奴，所描繪的其實是斯基泰人。⁹⁰勃勞烏卡認為，上述刺

認同這樣的比對，他認為匈奴冒頓單于在擴張初期往北打擊過的「屈射」，其古音更符合 *zgujaka 這個斯基泰的發音，參見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2(1966), p.17.

⁸⁵ Victor H. Mair, "Old Sinitic Myag, Old Persian Maguš and English Magician," *Early China*, 15(1990), 45-46.

⁸⁶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15-99。

⁸⁷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東京：東洋文庫，1960年），圖版 1、2。

⁸⁸ M. 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pp.87.

⁸⁹ S.I.Rudenko 著，加藤九祚譯，〈匈奴と他の諸民族の關係〉，《季刊ユーラシア》，3（東京，1971），頁 40。

⁹⁰ E. D. Philips, *The Royal Hordes* (London: Thomas & Hudson, 1965), p.117,121.

繡品中的人物和黑海北岸出土的斯基泰人的金銀器皿中及陶器上的人物完全一樣，這說明斯基泰人和屬於斯基泰的薩爾馬特人，已經把希臘式及巴克達利亞式的工藝品，經由中央亞細亞，傳到匈奴去了。⁹¹

另一個可供討論的考古出土物是陝西客省莊所出土的一件牌飾（圖 36），⁹²年代被斷為西漢，該墓被懷疑為匈奴墓。⁹³牌飾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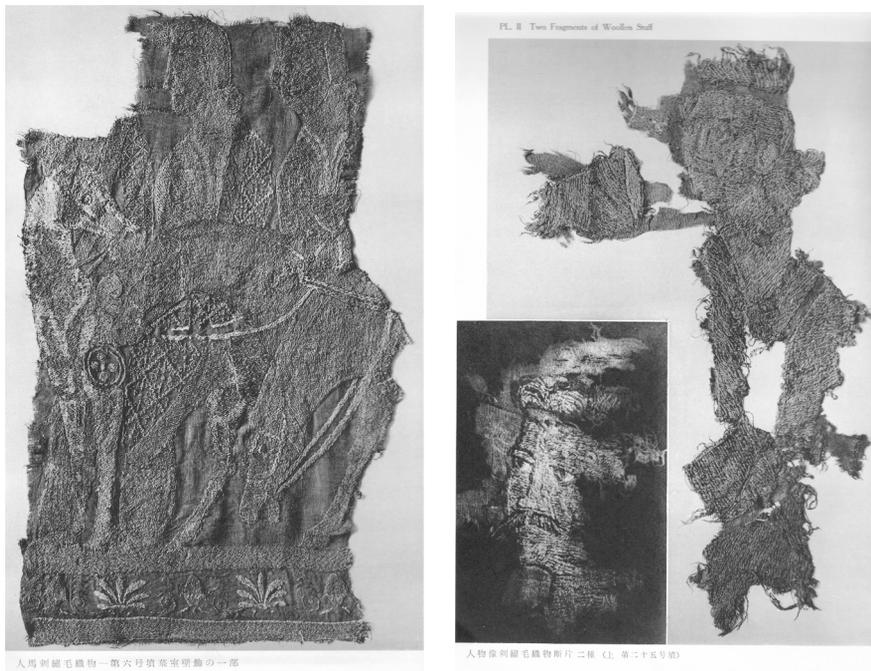


圖 35 蒙古諾音—烏拉匈奴墓葬中所出土之人像毛氈

資料來源：摘自梅原未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圖版 1、2。

⁹¹ 林幹，《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頁 367。

⁹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頁 139；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97），頁 127、183-184。

⁹³ 烏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90 年第 4 期，頁 410-411；喬梁，〈匈奴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收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張忠培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4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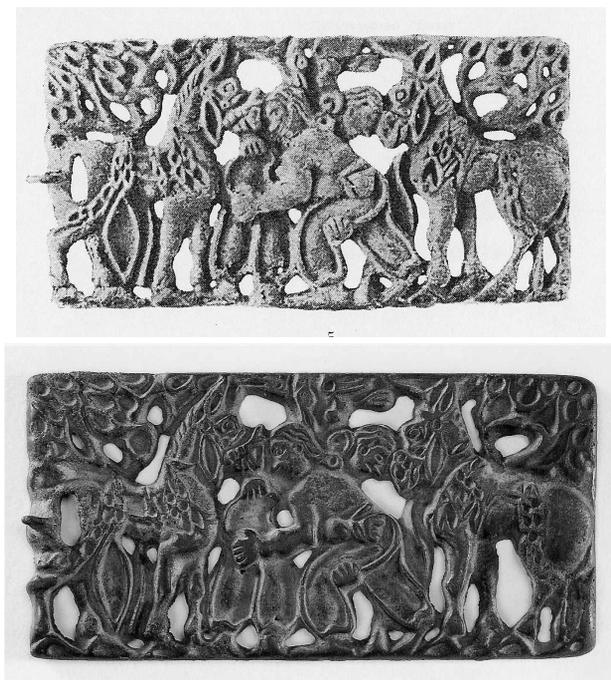


圖 36 客省莊出土牌飾（上）與西方收藏品（下）之比較

資料來源：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澧西發掘報告》，p.139（上）、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大草原の騎馬民族》，頁 127（下）。

題為兩個作摔跤狀的人物，成披髮狀，但值得注意的是髮末有椎結，高鼻特徵明顯。造型幾乎相同的牌飾廣見於西方的收藏品，此種造型的牌飾分佈於西元前七世紀至西元後四世紀的蒙古、南西伯利亞、大夏與巴爾幹地區，Bunker 認為牌飾上的人物相貌為歐羅巴種。⁹⁴此種高鼻椎結的人物造型，在西元前第一個千禧年的伊朗與烏克蘭都有發現，⁹⁵ Rostovtzeff 指出此種雙人摔跤的主題亦見於希臘藝術中所描繪的斯基泰人生活，而且此種習俗可追溯

⁹⁴ Jessica Rawson & Emma Bunker,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Hong Kong: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0), pp.303-304, 342; Jeny F So & Emma C.Bunker,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21-22, 90.

⁹⁵ Sergey Minyaev, "The Origins of the "Geometric Style" in Hsiung nu Art" in ed. by Jerannine Davis-Kimball et al. *Kurgan,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 (Oxford: Publisher of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2000), p.303.

至前祆教時期的早期伊朗人信仰儀式，與早期游牧伊朗人的英雄傳說有關。⁹⁶ 雖然這兩個考古出土品並不必然說明他們能反映匈奴的人種歸屬，但是從匈奴上層喜愛這些有濃厚伊朗人色彩的器物，至少能側面反映匈奴與游牧伊朗人間的緊密接觸。

上述的圖像不但事涉相當複雜的匈奴人種問題，也牽涉到匈奴與西域之間長期以來的密切關係。早在二十世紀初，日人內田吟風曾認為匈奴人至少在統治階層是屬於高加索種，⁹⁷ Otto J. Maenchen-Helfen⁹⁸、余太山⁹⁹、李昱東¹⁰⁰等人也認為匈奴的核心部落為歐羅巴種。在中國境內匈奴墓所出土的人骨雖然都屬於蒙古人種，¹⁰¹但在外蒙古、貝加爾湖、南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匈奴墓中所出土的人骨，卻呈現出蒙古人種與高加索種兩大人種並存與混雜的現象。¹⁰²雖然此種人種混雜的現象可歸諸於匈奴在擴張進入這些地區後，曾受到上述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原有歐羅巴種（Europoid）住民血統的滲透，¹⁰³但亦不能排除匈奴民族的人種

⁹⁶ M. 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93; M. Rostovtzeff, "The Great Hero of Middle Asia and His Exploits", *Artibus Asiae*, 4:2-3(1933), p.101-102.

⁹⁷ 內田吟風，〈匈奴の人種体型について〉，文收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88），頁143-165。

⁹⁸ Otto J.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364.

⁹⁹ 余太山，〈匈奴、Huns 同族論質疑〉，收氏著《塞種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242-271（原載《文史》第33輯）；余太山，〈犬方、鬼方、土方與獯鬻、匈奴同源說〉，收入氏編，《歐亞學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7-28。

¹⁰⁰ 李昱東，〈早期匈奴帝國核心部族的考證〉，《中興史學》，第7期（台中，2001），頁1-25。

¹⁰¹ 潘其風，〈從顛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收錄於徐元邦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第二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293-301。

¹⁰²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頁3-23。

¹⁰³ 周連寬，〈蘇聯南西伯利亞所發現的中國式宮殿遺址〉，《考古學報》，1956年第4期，頁55-66；奇列諾娃著，馮霞譯，〈南西伯利亞塔加爾文化起源的主要問題〉，收錄於孫進己等編，《中國考古集成 東北卷》（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11-14，魯金科著、潘孟陶譯，〈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頁37-48；諾夫戈羅多娃著、申屠榕譯，〈蒙古民族起源的初期階段〉，《民族譯叢》，1986年第4期，頁48-52。

狀態原本就是混雜的。¹⁰⁴就目前的證據而言，要判定匈奴的人種尚有很多問題無法解決，難以斷定該民族核心成員的種族歸屬。因為匈奴作為一個游牧帝國，隨著其征服與擴張的不斷發展，其內部成員之組成勢將日趨複雜化。特別是後來與漢朝的長期戰爭，為補充其戰士的耗損，又不斷從西域引進新的兵源及物資，¹⁰⁵這都極易造成匈奴人種的高度複雜性。

關於匈奴的起源地區，至今也仍在爭辯之中。俄國學者曾有匈奴起源自內蒙古東部的看法，¹⁰⁶但匈奴人即使是起源於內蒙古東部，其與南西伯利亞的關係應相當密切。顧頡剛嘗認為匈奴之族必在西北，¹⁰⁷小川琢治也指出匈奴原先應分佈於涇、洛水源之更西北方，戰國時因義渠強大之故而暫時南下受阻。¹⁰⁸江上波夫雖認為匈奴屬於蒙古人種，但也指出匈奴的原鄉可能要往葉尼塞河上游、陰山—鄂爾多斯一線西面的戈壁西部、準噶爾方面去尋找。從戰國至前漢時代匈奴所製作的青銅器來看，其與葉尼塞河上游的塔加爾文化以及天山—阿賴山脈的薩迦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這暗示春秋時代（前六—前五世紀）匈奴的原鄉，可能還要在陰山—鄂爾多斯的更西北方，¹⁰⁹匈奴文化的社會層面應曾受到薩彥—阿爾泰諸族（丁零系）貴族階層的明顯影響。¹¹⁰

¹⁰⁴ 林幹，〈關於匈奴、東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種的探索〉，《內蒙古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頁1-10；拙著，《先秦至兩漢胡人意象的形成與變遷》，頁206-239。

¹⁰⁵ Cosmo, Nicola Di, "Ancient Inner Asia Nomads: 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4(1994), pp.1092-1126；拙著，〈漢代長鼻胡人圖像初探〉，《故宮學術季刊》，26：2（台北，2008），頁13-46。

¹⁰⁶ S. Minyaev, "On the Origin of the Hiung-nu", *Information Bulletin*, 9(1985), pp.69-78.

¹⁰⁷ 顧頡剛，〈殷遺民流竄西北者結合鬼方以周〉，收入氏著，《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九卷（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7323-7324。

¹⁰⁸ 小川琢治，〈北支那先秦蕃族考〉，收羽田亨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 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5），頁284、308。

¹⁰⁹ 江上波夫編，《中央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第一章，〈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人種・民族・文化の形成と歴史の流れ〉，頁44。

¹¹⁰ Camilla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 (Vol.3 of Memoir of the Academy for Material Culture, Leningrad: 1932), p.15；アリエクサンドル・ミチューリン著，佐藤純一譯，〈南シベリアの古代文化（3）〉，《古代學》，5：3-4

因之匈奴的起源，與南西伯利亞及中亞的關係應十分密切。就漢代所表現的胡人形象看來，其頭戴尖帽，高鼻多鬚的特徵實與中亞塞種相差無幾，甚至幾乎相同。匈奴可能在早期階段曾與塞人文化存在過相當頻繁的接觸與交往，故匈奴人種中也包含了蒙古、塞種等複雜的成分。¹¹¹阿爾泰地區著名的巴澤雷克（Pazyryk）古墓群，雖然學界普遍認為其族屬應是早期活躍於中亞歷史的斯基泰人或塞種，但魯金科¹¹²與克勞森（G. Clauson）¹¹³都懷疑過該墓葬的主人也許是早期匈奴而非塞種。在匈奴早期活動地域西面的河西走廊，當時居住著另外兩種早期游牧民族月氏與烏孫，而其西北邊的準噶爾盆地、阿爾泰山及南西伯利亞地區則是塞種的活動地域。上述的這些族群在族屬上常被認為是屬於游牧伊朗人，因此匈奴在崛起的過程中曾與這些游牧伊朗人有過密切接觸，應在可以理解的範圍。更何況匈奴在頭曼時期國力仍弱，當時的情況據《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是「東胡強而月氏盛」，冒頓自立為單于之前還曾被頭曼送至月氏當質子。冒頓自月氏逃歸後，開始以新的方式來訓練自己的部隊，最後竟弑父自立。¹¹⁴有學者指出冒頓即是用月氏的訓練方式來領導匈奴騎兵並進行改組，結果成功地擊潰月氏，一躍而成為蒙古高原上的新強權。¹¹⁵月氏在遭匈奴擊潰西遷後，部分的月氏人疑似加入了匈奴，最後成為匈奴的一部份。如被霍去病擊敗的河西走廊匈奴渾邪部¹¹⁶與休屠部¹¹⁷，有學者認為他們即是加入匈奴的月氏部落。

（大阪，1957），頁327-328。

¹¹¹ 張志堯，〈略論我國阿爾泰、天山北部與東部的塞人——匈奴文化〉，《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6期，頁38-45。

¹¹² Sergei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52-53; John F. Haskins, "China and the Altai",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1988), pp.6-7.

¹¹³ G. 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譯，〈突厥、蒙古、通古斯〉，《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頁115。

¹¹⁴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887-2890。

¹¹⁵ 加富羅夫著，蕭之興譯，《中亞塔吉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75-76。

¹¹⁶ 陳世良，〈月氏音義詮索〉，《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頁88-98；陳世良，〈渾邪考〉，《新疆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頁38-47。

而來自西域的各種族群，無論是在匈奴崛起之前或匈奴控制西域之後，都不斷有西域胡族加入匈奴。岑仲勉曾以突厥既定西方後其國有不少九姓胡為例，來說明匈奴與伊蘭之關係。¹¹⁸岑氏之說在現在看來仍有啟發性，Beckwith 認為也許在最初時，匈奴曾經一度為這些游牧伊朗人所役使，從而自他們身上習得了不少游牧伊朗人的文化因素；或者當匈奴崛起之初，部份伊朗人塞種部落就是匈奴重要的組成份子。¹¹⁹因此若按 Beckwith 的觀點，匈奴其實也是廣義塞種的一支。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期，Minns 已有過同樣的意見，他認為從種種跡象來看，匈奴與斯基泰實無甚差別。¹²⁰故自匈奴崛起之初，來自西方的伊朗人就扮演著溝通西域與蒙古地區游牧勢力的角色，¹²¹塞種等游牧伊朗人在匈奴中的角色，應類似於後世粟特人在突厥、回鶻中的地位。¹²²來自內陸歐亞的伊朗系民族，無論他們原先是行農耕或游牧，都曾在蒙古地區在古代游牧帝國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這些游牧伊朗人後來可能因長期在匈奴的控制下而逐漸阿爾泰化，¹²³我們可以注意到

¹¹⁷ 錢伯泉，〈烏孫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遷的經過〉，《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頁104-111；錢伯泉，〈烏孫的種族及其遷徙〉，《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頁28-39。

¹¹⁸ 岑仲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頁36。

¹¹⁹ C.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p.72-73.

¹²⁰ Ellis 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New York: Biblio and Tannen, 1971), p.91-97, 252.

¹²¹ Sanping Chen, "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 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p.299-300.

¹²² 相關研究論文請參見 E.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41:4-5(1952), pp.317-352；張廣達，〈唐代六州胡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頁249-279；鍾焯，〈安祿山等雜胡的內亞文化背景——兼論粟特人的“內亞化”問題〉，《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67-84；魏義天 (Etienne de La Vaissiere)，〈粟特柁羯軍在中國〉，文收榮新江等主編，《法國漢學》，第十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35-240；彭建英，〈東突厥汗國屬部的突厥化——以粟特人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頁4-15；王睿，〈再論中國的粟特柁羯軍〉，《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頁14-25；專書方面可參考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の展開》（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2010）。

¹²³ Sanping Chen, "Some Remarks on the Chinese "Bulgar","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51:1-2(1998), pp.69-83.

匈奴內部所謂的「別部」或「雜胡」，譬如羯胡¹²⁴或者稽胡¹²⁵，都有來自中亞的痕跡。因此匈奴無論是在種族或文化上，游牧伊朗人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的。

四、結論

本文從漢代畫像石中胡人臉上的圓形文面圖樣，考察了此種文面圖樣的起源與意義。本文認為漢代胡人臉上的圓形文面，並不一定是漢人所施予的黥記，而是內陸歐亞民族的一項古老習俗。而此種圓形文面不但出現在中國北方的胡人，亦可見於中亞與西亞的伊朗系民族。在伊朗地區，此種文面具有貴種的象徵意義，與中國將黥面作為刑罰或奴隸的標誌意義大不相同。至於此種臉部圓形文面的起源，可能是早期印歐人的一種古老傳統，後來為游牧伊朗人所承襲後，演變為某種貴族之表徵。從此種圓形文面出現在漢代的胡人圖像中，或可反映匈奴與游牧伊朗人之間的早期關係。從匈奴中明顯的伊朗文化特性可以看出，匈奴的核

¹²⁴ 陳寅恪著、萬繩楠整理，〈五胡種族問題〉，《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97-100；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78），頁414-427；譚其驥，〈羯考〉，《長水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224-233；黃永年，〈「羯胡」「柘羯」「雜種胡」考辨〉，《唐代史事考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187-200；林幹，〈魏晉時期的匈奴族和羯族〉，《歷史教學》，1980年第10期，頁45-48。

¹²⁵ 如周一良認為稽胡為來自西域中亞的雜胡，見氏著，〈北朝的族問題與民族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周一良集》第一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188-197。唐長孺認為稽胡為一包含匈奴、西域胡及西域胡以外其他各族的雜胡，而所謂雜胡，都是與古代匈奴有統屬上或血緣上關係的各種「別部」。見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78），頁439-444。周偉洲則認為稽胡是以內邊南匈奴五部為主體，融合西域胡及山居土著（包括漢族）而形成的一種雜胡，見氏著，〈試論魏晉時與匈奴有關的諸胡〉，收入馬大正等編，《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371-373，又見氏著，《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頁147。西方學者的研究請參見Boodberg, Peter A, "Two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1936), pp.283-307; E.G.Pulleyblank, "JI HU 稽胡: Indigenous Inhabitants of ShanBei and Shanxi", in E. H. Kaplan and D. W. Whisenhunt (ed.), *Opuscula Altaica: Essays in Honor of Henry Schwarz* (Western Washington, 1994), pp.498-529.

心部族雖不必為游牧伊朗人（如塞種），但匈奴與其所存在的緊密關係，特別是雙方在文化上的同質性，是相當值得注意的觀察點。可以認為在匈奴部落聯盟中，部分來自內亞的伊朗人可能早自匈奴崛起之初，便在匈奴內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匈奴在族群與文化上的伊朗色彩，是我們在考察匈奴歷史時不可忽視的一個面向。

Facial Marks of Hu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ir Inner Eurasia Affinities

Chen Chien-wen

Abstrac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Xiong-n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Xiong-nu and Iranian Nomads of Inner Eurasia is an aspect the Chinese historians tend to overlook.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ircle shaped facial marks on the Hu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or from Inner Eurasia Nomad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marks on their faces are identical to the facial marks of Parthian nobles. This type of facial marks has a long history in Central Asia and was probably an important tradition among Iranian Nomads in this early period. The Xiong-nu from the Han Dynasty era and the Parthians had the same facial marks customs; the culture of Xiong-nu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at of the Iranian Nomads. The Saka (Early Iranian Nomads) probably o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Xiong-nu tribal society. The Xiong-nu race and culture ma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Iranian Nomads.

Key words: Hu People, Xiong-nu, Facial Marks, Inner Eurasian, Parthians, Iranian Nomads, Saka

